

从盘瓠形象变化看畬族文化变迁

杨正军

盘瓠传说作为民族创世神话流传于我国畬族、瑶族等少数民族中。盘瓠传说不仅以口头形式为畬族群众世代口耳相传，畬族群众还把它收入族谱、绘成祖图予以记录，甚至还刻成祖杖加以崇拜，编成歌谣广泛传唱。畬族群众中广泛流行盘瓠信仰。畬族日常生活忌禁、民族服饰等等也都留有盘瓠信仰的影子，可以说盘瓠信仰已经成为畬民族文化的缩影。本文试图通过考察分析畬族盘瓠信仰中盘瓠具体形象的变化及其成因，对畬族文化变迁的轨迹作一粗浅的探讨。

一、汉晋以前盘瓠的具体形象及其产生的背景

关于盘瓠传说，最早的文字记录出现在汉晋时期。《山海经》记载：“太行伯东有犬封国。”郭璞注：“昔盘瓠杀戎王，高辛以美女妻之，不可以训。乃浮之会稽东海中。得三百里地封之，生男为狗，生女为美人，是为狗封之国也。”^①《水经注》也说：“盘瓠者，高辛氏之畜狗也。其毛五色……”^②此

外,《风俗通义》、《魏略》、《玄中记》、《搜神记》等都有类似记载,其中以干宝著《搜神记》所载最详。其全文如下:

高辛氏,有老妇人居于王宫,得耳疾历时。医为挑治,出顶虫,大如茧。妇人去后,置以瓠萋,覆之以盘,俄尔顶虫乃化为犬,其文五色,因名“盘瓠”,遂畜之。时戎吴强盛,数侵边境。遣将征讨,不能擒胜。乃募天下有能得戎吴将军首者,购金千斤,封邑万户,又赐以少女。后盘瓠衔得一头,将造王阙。王诊视之,即是戎吴。为之奈何?群臣皆曰:“盘瓠是畜,不可官秩,又不可妻。虽有功,无施也。”少女闻之,启王曰:“大王既以我许天下矣。盘瓠衔首而来,为国除害,此天命使然,岂狗之智力哉。王者重言,伯者重信,不可以女子微躯,而负明约于天下,国之祸也。”王惧而从之。令少女从盘瓠,盘瓠将女上南山,草木茂盛,无人行迹。于是女解去衣裳,为仆竖之结,著独力之衣,随盘瓠升山入谷,止于石室之中。王悲思之,遣往视覓,天辄风雨,岭震云晦,往者莫至。盖经三年,产六男六女。盘瓠死后,自相配偶,因为夫妇。织绩木皮,染以草实,好五色衣服,裁制皆有尾形。后母归,以语王。王遣使迎诸男女,天不复雨,衣服褊褊,言语侏僂,饮食踈踈,好山恶都。王顺其意,赐以名山广泽,号曰“蛮夷”。……今即梁、汉、巴、蜀、武陵、长沙、庐江郡夷是也。^③

汉晋时期所记载的畬族先民盘瓠传说除了具有浓厚的神话色彩外,另一个重要特点就是盘瓠形象都是纯动物的形象。畬族先民中为什么会流行这样的神话?犬对畬民族究竟有过怎样的贡献而迫使畬族要世代记录它?

我们知道，中原汉族对中国南部的开发自秦汉时期开始，在此之前，南方民族经历了一个独立的发展时期，畬族的盘瓠传说正是在这一时期形成，之后才被汉族史家所记载。关于这一神话，它的产生并非完全是人们头脑中的随意幻想，而是有一定的社会历史基础的。正如拉法格所说“神话既不是骗子的谎话，也不是无谓的想象的产物”，“而是保存关于过去的回忆的宝库”，^④“神话是用想象和借助想象以征服自然力，支配自然力，把自然力加以形象化”。^⑤原始社会，由于认识自然的局限性，人们对恶劣的自然环境以及一些自然现象得不到圆满的答案，往往认为有某种动物、植物或其他自然物，以超自然的力量支配着自己的生存，于是他们借希望于对这种超自然力量的崇拜以达到庇佑自己的目的。这样便产生了图腾崇拜。“图腾崇拜是自然崇拜或动物崇拜与鬼神崇拜（祖先崇拜）的一种混合的宗教形式，其对象不是个别的动植物，而是该物类的全体，人们相信自己与之有特殊的关系，部落体依靠这种强大的向心力，团结整个民族部落的每个成员，形成一股强大的集体力量，‘以群的联合力量和集体行动来弥补个体自卫能力的不足’，便于与自然进行斗争”。^⑥

汉晋时期记载畬族先民中所盛行的盘瓠传说，可以说就是原始的图腾信仰。之所以把动物作为民族的图腾，是因为在信奉盘瓠的畬族先民的生产和生活中，狩猎经济占着很大的比重，是他们必不可少的生产活动和生活来源，在他们的狩猎经济中又扮演着一个不可或缺的角色，是人的生命和存在所依靠的东西，对于这些信奉盘瓠的民族来说就是神。借此，畬族先民把动物作为他们的图腾给予崇拜，而且还把它编成神话世代传诵就不难理解了。

二、汉晋至宋元时期盘瓠形象的维持及畬、 汉文化融合的发端、发展

汉晋时期是盘瓠传说被汉族史书大量记载的时期，而就在同一时期中原汉族开始了对中国南部的开发。而且自西汉开始中原与蛮族地区的交往日益频繁，“汉武帝平南越、通西南夷，对南方诸族多次用兵，特别是汉光武用重兵深入武陵蛮——盛行盘瓠传说的地区，从而使中原人对蛮族的社会及其风俗诸方面，才有了直接的而不是道听途说的、较为深入的而不是肤浅的了解”^⑦。

唐宋时期有关盘瓠传说的记载虽然很少，但通过目前仅存的几条材料我们仍可看到唐宋时期盘瓠神话中盘瓠的具体形象。如杜佑《通典》中就有这样的记载：“按范晔《后汉书·蛮夷传》，皆荒诞不经……且因而商略之。晔云：‘高辛氏募能得犬戎之将军头者，购黄金千镒，邑万家，妻以少女。’按黄金，周以前为斤，秦以二十四两为镒。三代以前分土，自秦汉分人。又，周末始有将军之官，其吴姓宜自周命氏。晔皆以为高辛之代，何不详之甚。”^⑧宋代《路史》中关于盘瓠传说的记载如下：“有自辰源来者云，卢溪县之四百八十里武山焉，其崇千仞，遥望山半石洞罅启一石，貌狗之立乎，其旁是所谓盘瓠者。今县之西南三十有盘瓠祠，栋宇宏壮，信之天下有奇迹也（记云山半石室，可容数万人，中有石床、盘瓠行迹。今石窟前石兽石羊，奇迹尤多。《图经》云：‘陞石窟如三间屋，一石狗形，蛮俗云盘瓠之像’……）。”^⑨南宋刘克庄《漳州谕畬》中也记载：“……二畬既定，漳民始知有土之乐。余读诸畬款状，有自称盘瓠孙者。彼尝读范史，知其鼻祖之为

盘瓠者。”^⑩如果说《通典》中对于盘瓠的形象没有给予直接说明的话,那么从两宋时期的《路史》和《漳州谕畬》所反映的有关盘瓠形象材料来看,我们可以确信,两宋时期盘瓠形象仍然延续汉晋时期的,没有发生变化。

虽然唐宋时期畬族盘瓠传说中盘瓠的形象没有发生变化,仍然是具有鲜明畬族文化特色的犬的形象,反映不出畬、汉文化的融合。但是有资料显示,这一时期是中原加速对东南开发,东南经济快速发展,畬、汉人民逐步融合的重要时期。唐初封建王朝在漳、汀一带设治,强化了封建王朝对畬族地区的统治,客观上促进了畬族地区社会经济的发展,密切了畬、汉两族人民在政治、经济和文化上的关系。^⑪而就在同一时期,另一汉人群体,汉客家民系进入畬族聚居区,对畬族的文化变迁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据史学家考证,客家先民南迁自东晋南渡开始,到唐五代时大批客家汉人已深入到畬族聚居的闽、粤、赣交界地区。^⑫客家的移入使得这一地区到两宋时期一直是畬、汉杂居的区域。畬、客的共处使无论是文化上还是生产技术上都较畬族先进的客家对畬族产生了全方位的影响,大大加强了畬文化与汉文化的交流与融合。

在这里需要强调的是,在封建一体化国家统治秩序向东南地区延伸、阶级压迫和剥削日渐加剧的情况下,畬、汉人民不断起来作自觉的联合斗争,共同抵抗封建统治阶级的反动统治。在这些斗争过程中畬、汉群众增进了解,密切了彼此的关系,也加速了汉族和畬族的融合。这方面的例子很多,如唐高宗仪凤二年(677年)广东汉族起义军首领陈谦会同畬族起义军首领苗自成、雷万兴等人,集结畬、汉两族群众攻陷广东潮阳的起义。南宋高宗建炎中(1127—1130年)漳浦地区、绍兴

十五年(1145年)江西虔州、广东的梅州以及福建等地相继爆发的畬汉两族人民起义。以及南宋理宗宝庆元年(1225年)赣州爆发的以陈三枪和钟全为首的畬、汉两族人民大起义等等。^⑬

继唐宋之后,元代可以说是畬族文化发展史上又一个具有重要意义的时期。之所以这样讲,主要是因为自唐初至宋末,畬族文化的变迁是在畬族聚居的闽、粤、赣地区,在畬族与汉族的客家民系的交往、互动中发生的。但自元初,因为元朝统治者的民族压迫政策和畬族参与的反元斗争的失败,导致原来聚居于闽、粤、赣边的部分畬民被迫大范围的迁徙而进入非客家的汉人区域(闽东、浙南)。原居闽、粤、赣边地的畬民继续与客家相融合,而对于迁入其他非客家区域的畬民来说,因为他们处于一个高度封建化的汉人社区的包围之中,所以其与汉族的融合有加速的趋势。^⑭

三、明清时期盘瓠形象的转变与畬汉文化的融合

明清时期,具体在清朝中后期,畬族盘瓠信仰发生了一些变化,主要表现在畬民对盘瓠传说进行了针对性的改造、理会与解说。畬民家族的人们对原有的纯动物的原型予以重塑,盘瓠遂成了龙或龙与麒麟的组合,并命名为龙期(龙麒)。如畬族史诗《高皇歌》就记载:“……当初出朝高辛皇,出来游戏看田场。皇后耳痛三年在,挖出金虫三寸长。挖出金虫三寸长,便置金盘拿来养。一日三寸望长大,变作龙期丈二长。变作龙期丈二长,五色花斑尽成行。五色花斑生得好,龙眼变作荔枝样……”^⑮现存厦门大学人类学博物馆的清代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宁德畬民《雷氏祖图》所描绘的内容与上述《高皇歌》的记载相同,以前的图腾盘瓠已不复存在,而代之以具

有麒麟头，龙身的龙麒。还有，此时期这一地区畬族群众祭祖时用的祖杖也改为了龙头杖。

清朝中后期畬族盘瓠传说中盘瓠由原来的动物形象转变为龙与麒麟的结合，说明这一时期畬族已经融入到汉族社会当中，畬文化已经逐步与汉文化相互融合了。因为，无论是作为民族图腾或者仅仅是一种象征，龙、麒麟都早为中原汉族所信仰和认同，是中原汉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清代畬族也信仰龙、麒麟，这正说明他们对汉文化的认同（无论是自发的也好，被动的也罢）。而且，盘瓠信仰作为一种观念形态，是建立在一定的经济基础之上并为一定的政治制度所制约的。清代中后期，盘瓠形象的变化不仅仅是一种文化观念的转变，它更反映了这一时期畬族经济和政治上的变迁。

自元初闽、粤、赣交界地部分畬民外迁以来，直到明末清初，无论是留在闽、粤、赣边地与客家杂居的畬民，还是外迁处于非客家汉人包围的畬民都不同程度的经历了一个加速融入汉族社会的过程。发展到清朝中后期，畬族与汉族相互融合的程度已经相当高了。这在如下几个方面都有所体现：

（一）经济方面。畬族地区从原来的刀耕火种的生计模式向以梯田水稻耕作和定居旱地耕作为核心的生计模式转变。由于传统上畬族所居住的地区都是偏远的山区，自然条件很差，他们所开垦的土地能得到的收成，除掉缴纳的赋税部分，维持自身生活都存在困难。在这种情况下，部分畬民被迫向汉族地主租种土地，成为汉族地主的佃农。起初，他们“力耕作苦，或佃种田亩，或扛抬山舆”过活，^⑥后来发展到“散布山泽之间，亦受民田以耕，谓曰平民百姓”，^⑦还有些畬民“亦购华人田产”拥有属于自己的土地。^⑧这些事实说明在这一时期畬族

已经完成了生计模式的转变，在经济生产和经济生活方面融入到汉人社会。

(二) 政治方面。经济上畬族完成了从刀耕火种的游耕到定居耕作的转变，在政治上，畬民也相应成为封建统治者的编户齐民。清初推行保甲制，“世祖入关，有编制户口牌甲之令。其法，州县城乡十户立一牌长，十牌立一甲长，十甲立一保长。户给印牌，书其姓名丁口”。^⑩从乾隆时期开始清廷陆续在畬族地区实行保甲制度。“清乾隆十七年，督抚绘畬民图册以进奉”。^⑪以后，清政府将部分畬民正式编为保甲，“邑有畬民，以钟、蓝、雷为姓……今具遵制编保甲，从力役，视平民无异”。^⑫

(三) 文化观念方面。随着经济和政治的封建化，畬族在文化观念上也表现出与汉族的融合，这方面最突出的表现应该就是上述畬族盘瓠传说中，盘瓠形象由动物形象转变为龙与麒麟的结合。

虽然清朝中后期畬族与汉族在政治、经济、文化观念等方面的融合为盘瓠形象的转变提供了客观基础，但是盘瓠形象在清中后期的转变是与这一时期畬族与汉族在科举领域的竞争，以及畬族知识分子对畬族文化发展的指向直接相关的。

清朝中后期，伴随畬族社会汉文化观念的提升，一些畬族知识分子接受汉族封建文化的熏陶，普遍要求参加科举考试。然而现有资料表明，各地畬族在参加科举考试的过程中受到来自汉族一方的阻力。因为，畬族知识分子参加科举考试无形中会增加科举的竞争性。为了阻止畬族参加科举考试，部分汉族不惜以畬族盘瓠传说作为污蔑畬族的口实。如清嘉庆七年

(1802年),“福鼎童生钟良弼被诬为犬而不准与试”。^②清代《建阳县志·礼俗》中记载“嘉庆间有出应童子试者,畏思特甚,惧为汉人所击,遽冒何姓,不知彼固闽中旧土著也”。^③另外,清朝光绪年间(1875—1908年)《处州府志》也记载:“畚民有读书者入衙门充书吏,未敢考试。间出应试,土人辄攻之,曰:‘畚民系盘瓠遗种。’”^④诸如此类事情经常发生,迫使已经接受汉式教育和汉族文化的畚族知识分子为改变不利状况而极力寻求汉文化的正统性认同。正是在这一背景下,早为汉族所认同的龙、麒麟(龙与虎相斗,龙与麒麟相合,符合“易经”命名法)再一次走到了历史的前台,被畚族知识分子所接受,并被书写而进入畚族的文本当中,成为畚族也崇拜的图腾。

从上面盘瓠形象转变的过程中畚族知识分子发挥的作用来看,畚族知识分子为其民族文化观念的变化指出了方向。先是有部分畚族接受了汉文化的教育,成为掌握了汉族文化的知识分子;紧接着,在畚族文化与汉族文化发生激烈碰撞时,这些畚族知识分子及时地根据情势对原来的畚族文化做了针对汉文化的改造;之后,才有畚族群众对这种改造后的畚族文化的逐渐认同。畚族知识分子对于畚族文化观念的转变实际上起到了“指向性”的作用。

结 论

以上部分作者说明了从汉晋以前直到清代,不同时期畚族(唐朝之前为其先民)的盘瓠信仰中盘瓠的具体形象及其文化背景。通过分析我们看到,畚族盘瓠信仰中的盘瓠形象从汉晋时记载的动物形象过渡到清中后期的龙、麒麟形象,这一转变

过程正好与历史上汉民族与畬族（畬族形成以前是所谓的“蛮族”）由接触到了解，再到融合的过程是同步的。

汉文化与畬文化在清朝中后期的融合，是历史上两个文化体系由接触到了解再到发生互动才最终产生的。从汉文化的角度而言，它有一个逐渐向边远地区畬族传播的过程；从畬文化角度讲，它又对汉文化的传播发生互动，作出反应。一方面畬族面临汉文化的冲击，但同时他们又没有放弃自己民族的文化传统。表现在畬族盘瓠信仰上，虽然清朝中后期盘瓠的形象变为了极具汉族文化特征的龙、麒麟的形象，但就盘瓠传说本身而言，它的故事结构并没有发生改变，它始终是畬族记述其弟兄祖先（蓝、雷、钟）的含有弟兄祖先历史心性的民族创始神话。而且，与盘瓠形象变化不同的是，时至今日，许多地方的畬族在其日常饮食禁忌、服饰习俗以及仪式中都保留有原始图腾的影子，这些都体现出畬文化在与汉文化接触、交流的过程中，畬文化与汉文化的融而不合，和而不同的特点。

另外，从清朝中后期已经接受过汉文化教育的畬族知识分子对盘瓠形象向龙、麒麟的转变过程中所起的作用来看，汉文化因素是通过畬民族内部的信息传播网络而与畬族社会成员发生关系，并被解释、吸收并与畬民族文化体系相整合。在此过程中，畬族知识分子对于畬民族文化观念的变化起到了“指向性”的作用。

直到今天，畬民族中仍然广泛流传盘瓠传说，而且，不同地区的畬族对盘瓠传说的解释存在着明显的差异，居住于闽东、浙南地区的畬族认为：“龙麒是高辛氏第五个妻姓刘名君秀亲生的儿子，他的出生时间，是高辛帝在位四十一年五月五日，即公元前1367年。”^⑥这种解释明显的是将盘瓠形象人化，

对他们而言,盘瓠根本不是犬,龙麒也仅仅是人的一个名称而已。与此不同,居住在闽南、闽中、闽西地区的畬族对盘瓠的原初形态较不忌讳,在他们的族谱中明确记载他们是盘瓠(盘瓠)的后代。^⑨不同地区的畬族对盘瓠传说有不同的解释,说明了他们在历史上与汉文化交流、碰撞激烈程度的不同。

当然,随着时代的发展,改革的深入,畬族与汉族和其他少数民族的交流互动将会不断得到加强。在党的民族政策的指引下,畬族人民将会以更博大的胸怀,在保持本民族传统的基础上广泛汲取其他民族文化的优秀成果,积极推进畬族文化的发展。可以想见的是,在未来的发展过程中,集中体现畬民族文化特色的盘瓠传说将会以更加五彩缤纷的形式呈现在我们面前。

注释:

①《山海经》卷一二《海内北经》。

②《水经注》卷一七《沅水》。

③[晋]干宝:《搜神记》卷一四,1页。

④拉法格:《宗教和资本》,3页、53页,北京,三联书店,1963。

⑤马克思:《政治学手稿导言》,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六卷,4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⑥施联朱:《畬族研究论文集》,241~242页,北京,民族出版社,1987。

⑦吴永章:《瑶族史》,14~15页,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3。

⑧[唐]杜佑:《通典》卷一八七《南蛮上》。

⑨[宋]罗泌:《路史》卷二《论盘瓠之妄》。

⑩[宋]刘克庄:《后村先生大全集》卷九三《漳州谕畬》。

⑪施联朱、蒋炳钊等:《畬族简史》,17页,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0。

▼
⑫罗香林：《客家研究导论》，37~51页，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2。

⑬同⑪，34~37页。

⑭谢重光：《畬族与客家福佬关系史略》，215~226页，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2。

⑮参见《畬族社会历史调查·畬族史料摘抄》，365页，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6。

⑯周荣椿：《处州府志》卷二九《艺文志中·文编三》，清光绪三年刊本。

⑰张景祁：《福安县志》卷三八《杂记》，清光绪十年刊本。

⑱江远青、江远涵：《建阳县志》卷二《舆地志·附畬民风俗》，道光十二年刊本。

⑲《清史稿》卷一二〇《食货一·户口、田制》。

⑳余钟英：《古田县志》卷二一《礼俗志·畬民附》，民国二十九年铅印本。

㉑郑一崧：《永春州志》卷七《风土志》，清同治十一年刊本。

㉒陈寿祺：《重纂福建通志》卷一四〇《国朝宦绩》“李殿图条”，清道光十五年刊本。

㉓同⑱。

㉔同⑯。

㉕蓝炯熹：《畬民家族文化》，29页，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2。

㉖同㉕。

（作者单位：厦门大学人类学研究所）